



岑娇娟

孩子，你可曾听到妈妈的呼唤

岑娇娟（华人英雄曾喆的妈妈）

在纽约华埠美洲博物馆门口对面，哥伦布公园北侧“曾喆路”的路牌下面，记者采访了“9·11”华人英雄曾喆的母亲岑娇娟女士。

5年了，尽管每次提起曾喆，都会伤心。但岑女士通过做义工和积极参与社区的活动等有意义的方式，渐渐走出了失去爱子的阴影。

岑女士的生活经常是这样安排的：

周一，到家附近12街的老人中心参加活动，下午的节目是跳交际舞。周二，在住宅附近的老人中心，作为跳舞教师助理，协助教导老人家跳舞；周三，跟朋友去跳舞；周四，拜访朋友；周五，到唐人街麦迪臣社区中心耆英合唱团唱歌；周六，参加海韵合唱团外出表演。

岑女士目前居住在布鲁克林羊头湾一座两层的住宅，丈夫前些年已经过世，自己居住在二楼，长子一家住在一楼。长子是纽约一家餐馆的厨师，育有儿女二人。

岑女士依旧保持昔日俭朴的生活方式。家里的客厅陈设简洁，显眼的是一套黑色沙发和一台电视机。她说，多年来习惯了俭朴的生活，对生活

没有奢求。

8月初，岑女士与居住在波士顿的弟弟一家外出旅行，游览了黄石公园。2004年，曾回故乡广州探亲。

岑女士对记者说，失去儿子曾喆对自己的影响很大，这是无法弥补的。谈起儿子昔日的往事，岑女士的眼睛含着泪水，声音哽咽。

但她觉得欣慰的是，曾喆出事之后，美国各界、中国许多机构和有关人士，都向她表达了问候和关心。甚至美国华盛顿新移民中学的多位年轻人来信表示要给岑女士当儿子。

花了两年多时间才走出了失去儿子的伤痛，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抚慰了这位母亲的心灵。5年来，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关心，纽约市在华埠命名了“曾喆街”（Zhe “Zack” Zeng Way），曾喆生前工作的纽约银行，以曾喆的名字命名该公司的会议厅。据了解，该公司享有这样荣誉的仅有两人，另外一人是该公司的创始人。曾喆读书的罗彻斯特市，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辆救护车，他的母校，成立了“曾喆基金”。所有这一切，都表达了社会各界对曾喆舍己为人精神的肯定。



上飞机前按指纹已成美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年用的警徽，我一直珍藏

伍雅倡（纽约警局109分局侦探）

2001年9月10日，我接待一个朋友游玩纽约，我们乘坐着Ferry，欣赏着曼哈顿高楼大厦林立的壮观景色，双塔在群楼之中格外引人注目，我就再一次拍下照片。我从小在纽约长大，每次看到这个景色都觉得很美。谁都没有想到，我在9月10日拍到的曼哈顿双塔照片竟然是绝景。

第二天，早上10点钟，我还在睡梦中，就被朋友的电话吵醒。迷迷糊糊之中，听到了朋友非常夸张的声音，声音之中还掺杂着惊恐：“世贸中心双塔被飞机撞毁了！”当时，我对此半信半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5分钟之后，当朋友的电话再次打来，我终于意识到，这是真的。做了20年的警察，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我知道，有大事发生了。于是我马上回到警局109分局。那时，警察局一片混乱，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几乎瘫痪。

在冷静一些之后，我们组成了一个十几人的小队，去了南街码头，在那里等待命令，准备去现场抢救。当时，那里聚集了几百名等候命令的警察，可是当时现场还在不停地燃烧和爆炸，没有办法接近。

在焦急中苦苦等待几个小时之后，晚上6点钟，市政厅附近已经像白灰城一样，我

们试图接近事发地点，但是燃烧和爆炸使得周围大面积地区的温度很高，不断有车胎爆炸，车子被砸。

到了深夜，我们部分警察被分成两班，一天24小时连续在停尸房工作。那里主要是负责解剖验尸，属于警探部的范围。我于是在9月12日来到了位于2大道32街的纽约大学附近的验尸房。当时，埃里已经搭起了临时尸检房，以备应急用。在那段黑色的日子里，我们共接到了上万件，当时估计死伤者超过3000人。

虽然我做警察有20年了，也经历过很多凶杀案，但是第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接触到这么多的尸体。看到这么多生命失去，当时心情是沉重的。尤其是，在这些尸体当中，也有不少是警察和消防人员的。有的警察尸体上还仍然带着当时去营救人的铁甲和绳索。见到这样的情景，让我们每一个警察都觉得由衷的悲痛。

5年过得很快。5年之后回头来看，恐怖分子对纽约造成了很大的打击，生命、财产都造成了损失。并且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了阴影。世贸中心没有了，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并随时随地保持警惕。“9·11”以后，纽约的犯罪率也降低了。“9·11”那年使用的警徽，我也会一直珍藏。

风雨之后生活依旧

为了纪念“9·11”五周年，记者采访了美国数十位与“9·11”直接相关的人物、商家、社区组织、政府机构等。灾难来临时刻，人性的本质就会暴露无遗。我们试图寻找其光辉的一面，这是人类文明不断前进的动力。

正如在“9·11”中献身英雄曾喆的母亲岑娇娟说的那样，曾喆的精神，不仅代表了他自己，更体现了当今华人华侨的形象。

回顾过去是为了珍惜现在，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在英国政府破获恐怖团伙后，英国所有机场加强戒备，人满为患



一周我都处在半梦半醒之中

陈思进（世贸大楼亲历者）

“9·11”当天我在世贸北塔80层8067室上班，经历了一个半小时的逃生历程，终于在北塔倒塌之前安全撤离。事件发生之后，整整一个星期，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处在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之中。人很困乏，但总是无法入睡。

“9·11”对我的最直接影响，首先是丢了工作。

世贸遭遇袭击之后，华尔街停市一周，重新开市之后，我所在的证券交易公司Brut ECN所有的员工就转移到了新泽西英代尔公司的大楼上。

由于公司被兼并，我于2002年12月16日接到Brut ECN的解雇通知，一个月后，成了无业人员。

幸运的是，尽管此刻是圣诞节后雇工清淡的时期，仅仅经过两个月的求职和等待，我找到了新的工作：瑞士信贷银行的助理副总裁（AVP），负责该银行的软体发展。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状态：快乐、健康。经过“9·11”这样的经历，对人生的看法有了新的视角。



那黑色记忆 考验幼小心灵

劳伦·埃贝林（“9·11”遇难者家属）

2001年9月11日是劳伦·埃贝林10岁的生日。但是劳伦再也没有盼回父亲。那一天，父亲迪安·埃贝林在世界贸易中心遇难。出乎意料的消息总会时刻提醒那一场灾难带来的伤痛。劳伦一家2002年终于获得迪安的部分遗骸，并悲痛地将它们埋葬。2003年，尸体的其他部分也被寄回家中。

上周，劳伦一家得知，纽约医疗主管机构和一家公司签订了150万美元合同，将对“9·11”中未经确认的9797块尸体残骸进行DNA测试。

对于母亲埃米来说，自己再也不想听到丈夫残骸被找到的消息，因为每一个这样的消息都会揭开家人新的伤口。每当电视上有“9·11”追踪报道的画面，埃米都会“发疯”似的冲过去蒙住女儿的眼睛。埃米曾对劳伦说她可以把生日改在9月12日，但劳伦坚持不改。

实际上，不是所有家庭在痛失一员后都会一直生活在“9·11”的阴影中，失去母亲的萨莎·特索伊-利娅和父亲维亚切斯拉夫·利娅就已收起悲伤开始新的生活。

2001年，萨莎4岁。那年的9月11日是她母亲在世界贸易中心上班的第一天。萨莎的母亲来自哈萨克斯坦，当时已拿到美国绿卡，她被故乡的亲朋好友们认为是最幸运的女人。当灾难发生时，这家人来到美国仅仅3周。“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新的。”维亚切斯拉夫回忆道，“我们不能空手而归。”

温雪姣（新华社供本报特稿）